

西部地区 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

叶普万 郭旭◎著

XIBUDIQU
NONGMINGONGPIN KUNWENTU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地区 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

叶普万 郭旭◎著

XIBUDIQU
NONGMINGONGPINKUNWENTIT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叶普万,郭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161-5723-7

I. ①西… II. ①叶…②郭… III. ①民工—贫困—研究—西南地区
②民工—贫困—研究—西北地区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31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彬

责任校对 季静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np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03 千字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第二节 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3)
第三节 农民工贫困线研究综述	(8)
第四节 研究对象、内容、基本框架及方法	(11)
第二章 农民工贫困的基本理论	(14)
第一节 贫困的经济学理论	(14)
第二节 贫困的社会学理论	(22)
第三章 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及贫困状况	(35)
第一节 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	(35)
第二节 流动人口发生的背景与原因	(36)
第三节 农民工的边缘特征及贫困状况	(45)
第四节 农民工贫困的原因	(56)
第四章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特点及流动原因	(61)
第一节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61)
第二节 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分析	(64)
第五章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贫困现状及基本特征	(69)
第一节 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几个贫困概念	(69)
第二节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82)
第三节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贫困现状及基本特征	(90)

第六章 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的原因分析	(104)
第一节 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的外部原因	(104)
第二节 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的内部原因	(111)
第七章 西部地区农民工减贫的思路	(115)
第一节 以市场为导向,全面实施农村劳动力资源提升 战略	(115)
第二节 积极调整和完善社会政策,切实消除人文贫困	(118)
第三节 努力缩小城乡差异,推动城乡一体化	(120)
第四节 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促进农民工与城市 社会的融合	(123)
第五节 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根除对农民工的观念歧视	(124)
第六节 合理确定农民工贫困线,为农民工减贫提供 理论依据	(125)
第八章 结语	(131)
第一节 结论	(131)
第二节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32)
参考文献	(134)
附录	(141)
后记	(14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一 选题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西部地区由于受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在“推—拉”两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量的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涌入相对收益比较高的城市。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止到 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6261 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 64.7%,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 17.1%,但增长速度高于中东部地区。

这一趋势也意味着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大量转移到城市。西部地区大量农民工的转移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增加了西部农村地区的劳务收入,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农民工受到城市文明的洗礼,他们把现代文明带回农村,有利于提高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二是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专家估计,农民工每年给城市创造一两万亿元人民币的 GDP 增量。^①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有机整合到城市社会发展中去。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城市管理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遭遇许多问题。主

^①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2 页。

要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工资被拖欠现象严重；工作和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困难；经常被歧视等。目前，农民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各地区各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等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惯性依然阻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各种权益的获得，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的缺失，使他们在城市中逐步被边缘化，从而成为城市贫困的主体。农民工贫困群体的出现，一方面提高了城市的贫困发生率。另一方面，在一些城市，农民工聚集地形成新的城市贫民区。特别是在西部地区，随着城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开始出现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的趋势。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由于我国目前对城市贫困人口统计是以户籍为标准的，农民工贫困群体并没有被纳入城镇贫困当中。另外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在家务农人员的收入，因此他们又不能被列入农村扶贫的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农民工就成为中国减贫政策所遗忘的群体。但实际上，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虽然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居住环境、生活消费都是在城市当中，而且又没有社会保障，所以很容易陷入贫困。因此，应当将农民工贫困群体纳入城市贫困的研究范围。

二 选题的意义

第一，填补了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研究的理论空白。作为城市中的一个庞大群体，农民工近年来广受媒体和学界关注，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实际上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陷入贫困的表现。纵观国际社会贫困研究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以往贫困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普遍性”，即研究贫困人口的总体生活表现、原因，以及与之对应的贫困测量手段和反贫困对策，对特殊群体特别是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关注甚少。纵观国内，到目前为止，对农民工的政策管理、权利保护与援助服务已成为政府与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领域，而将农民工与“贫困”挂钩进行专门研究的却屈指可数，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研究近乎空白。即使极少数学者谈到农民工贫困，也是以东部城市为参照。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农民工的主要集中地，从绝对数量上看是农民工贫困的主要发生地。二是因为西部地区一直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问

题一直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加快西部地区劳动力输出也是作为农村扶贫的重要手段来抓。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理论界对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的忽视。

第二，为西部地区农民工减贫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根据我国东西部产业演变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现状，农民工在保持向东部沿海流动主流不变的同时，向西部地区转移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农村贫困逐步向城市转移，从而使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在未来城市贫困群体分布中所占比重急剧上升。

西部地区深处内陆，区域发展较为落后，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低，城市贫困与尚未解决的农村贫困交织在一起，使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在贫困的状况、程度和发生机理上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因此，研究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将农民工贫困纳入城市减贫工作的重点，有利于西部地区（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对构建西部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城市农民工贫困实际上是农村贫困的转化，农民工贫困的解决与否关系到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

第二节 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一 国外关于“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国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式的农民工这一群体，但其对流动人口以及贫民窟问题的研究，对研究中国农民工的贫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西方社会与中国一样，都在某一历史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中去的现象。但是，西方社会这一现象出现得较早，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出现了。工业革命以后，农村人口包括海外移民纷纷涌入主要工业城市，人口流动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平衡和秩序，滋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住房拥挤、卫生恶劣、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差、城市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贫困问题异常尖锐。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一批批的“贫民窟”，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等都出现过类似的“贫民窟”。移民的贫困状况首先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和政

治学家的关注，他们著书立说或者直接发起社会运动以企图改变贫民的状况。

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对流动人口的居住情况进行了描述，“不论在老的或新的工人区里，那种又臭又脏的情况实在难以形容，还不及中世纪农奴住的茅屋……在伯明翰和布拉德福德这些城市里，几千所工人住房都是背靠背地盖起来的……厕所一般在地窖里，脏的无法形容；猪圈一般设在住房下面，而这些猪经过几个世纪没有上街后，又在大城市的街上闲逛了……公共厕所极少，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地方，1843—1844年时，7000居民有33个厕所——这就是说，每212个人只有一个厕所。即使设计的水平这样低下，即使是如此的恶臭和污浊，在许多城市中连这样的住房也很缺乏；于是出现了更糟糕的情况，地窖也用来作住所……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伦敦仍然有20000人住在地下室……”^①

概括起来，国外学者对流动人口贫困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贫困的成因。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贫困源自于个人因素。早期的资产阶级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如斯宾塞、S. 索姆布洛索等人认为，穷人或者性格有缺陷，或者生理有缺陷。贫穷的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特性，穷人应该对自身的贫穷负责。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要么是因为他们是懒惰、不节俭、不努力工作或者与遗传相关的低智商有关，要么是他们的道德品行以及其他陋习，如赌博、酗酒、吸毒或违法犯罪等一系列行为所致。

其二，贫困源自于社会制度。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认为，贫困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为此，英国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以萧伯纳和韦伯夫妇等为代表，于1884年成立了费边社。费边社强调：贫困不是个人的过错，消除贫困首先是政府的责任。韦伯夫妇甚至为贫民提出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免费教育、改善工人工作环境、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等具体的减贫措施。马克思·赛尔（Maxine Seller）通过对欧美大城市的犯罪情况调查后指出，外来

^① [美]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42页。

移民的犯罪率低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另外一些美国学者还专门对加州1900—1927年间的亚洲移民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真正的亚裔罪犯其实也寥寥可数。大卫·沃德（David Ward）认为大多数外来移民都过着努力工作的生活，他们所在社区的恶劣条件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因为市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供水设施、合理的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①

除了认为贫困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一些学者还分析了贫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原因。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一些社会改革者就注意到社会文化对贫民的影响。如美国著名的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撰写了《赫尔会所图文集》，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y）的《芝加哥贫民窟状况》，劳伦斯·威利尔（Lawrence Eviler）和罗伯特·德雷斯特（Robert Detester）合著了《贫民窟住宅问题》，她们认为城市贫民之所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素养低下，要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提供学习和娱乐的场所，教他们语言、礼仪和技能，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增强生活自立能力，缩小与“特权阶层”之间的差距，以更好地融入社会。1959年刘易斯（Lewis）通过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民窟进行一系列研究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与此同时，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和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等通过对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念架构。该理论认为，贫困文化是穷人适应外在环境的结果，而并非穷人自身的错误，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部力量。这一理论为研究流动人口贫困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关于流动人口以及贫民窟的减贫对策。应该说，早期社会学家关于流动人口贫困治理的观点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如英国先后通过了《济贫法》、斯品汉姆兰制度、《工人赔偿法》等，涉及贫民的住房、工资、工作条件、工伤保险等方面。德国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进城农民的文化水平，工厂禁止接收没有经过义务教育的童工，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问题，并将进城农民纳入到城市现有的职

^① David Ward. *Poverty, 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 1840—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6.

业教育体系。

S. M. Toh, A. S. Denisi 等学者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为迁移者提供友好的帮助,提供迁入地的知识、组织文化等方法,以使迁移者摆脱边缘化的状态。^①

西方国家早期对流动人口贫困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在贫困的形成原因上主要侧重于贫困的制度分析,在对贫困的治理上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国外关于流动人口贫困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农民工贫困提供了思路:贫困特别是流动人口的贫困不仅仅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还是外部社会环境的产物。消除贫困需要借助于外部力量,通过改善贫民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贫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增强贫民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 国内对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对农民工贫困的关注则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近几年才开始从政策层面关注农民工贫困。在这期间,有一部分学者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一定影响的关于农民工贫困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黄平等主编的《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编著的《流动的贫困——中德合作——云南城市贫困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其他对于农民工贫困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中,像陈端计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叶普万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从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对农民工贫困现实的分析,主张将农民工贫困群体纳入城镇贫困当中;其次,对农民工贫困的原因及对策的分析。

概括起来,关于农民工贫困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的层次。主要关注物质贫困,同时也把

^① S. M. Toh, A. S. Denisi. Host Country Nationals as Socializing Agents: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7, 28 (3): 281—301.

人文贫困和权利贫困纳入研究视角（王雨林，2004；方晓玲，2004；杨云峰，2007）。

第二，农民工贫困的分类。国内对于农民工贫困的分类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将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认为目前农民工的贫困属于绝对贫困，有的称生存性贫困、温饱型贫困（陈端计，2006）。有的学者将农民工流动前后的收入进行对比，认为农民工属于相对贫困。还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工的贫困是发展性的贫困（李恒春，2008）。

第三，农民工贫困原因的阐释。主要有：（1）结构或制度论：（李裕林等，2007；樊而淑等，2008；赵红宇，2008）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户籍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造成农民工贫困的根源。朱慧涛（2005）还把由制度和结构缺陷引起的贫困称为“结构性贫困”。（2）权利论：（洪朝辉，2002；魏秀珍，2004）农民工的贫困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人相比缺乏公正的社会权利，由此导致农民工在获取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等权益时的机会缺失。

从国内相关文献对于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研究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对农民工贫困的关注，已从单纯的关注收入状况转向重视权利和能力的被剥夺，其中为农民工赋权、加强人文关怀成为理论研究的共识。第二，研究的方法进一步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接轨。已从传统的规范分析逐渐转向实证分析，或者将二者相结合。第三，研究的层次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的贫困不仅分析贫困者的自身因素，更加注重从宏观背景和体制层面等外部因素考察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

由于对农民工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其一，在研究范围上，主要立足于“普遍性”，即研究总体农民工贫困人口的生活表现、原因以及减贫对策，很少将农民工进行区域划分，比较贫困的异同。特别是西部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农民工输出地的特点导致研究者忽视了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的客观事实。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停留在静态研究的层面，而且很多研究都是对同一问题的反复说明，缺少新意。其三，对农民工的贫困程度和测量上，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可行性的标准，难以提供有效的农民工的减贫模式。其四，对贫困的理解上，多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如收入水平或在收入之外的物质层面上（住房、消费、公共服务等）。虽然近年来，国

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强调非物质方面的贫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人力资源方面贫困的强调,如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等。应该说,这种看待贫困的方式非常重要,但似乎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农民中的“优秀群体”——农民工是贫困的。实际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理解贫困的方式——那就是过分强调单个个体的资源占有量,而忽视了农民工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和阶层而存在的。因而,造成群体贫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主体之外的客观社会因素,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人口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发展问题。

第三节 农民工贫困线研究综述

一 国外对“农民工”贫困线问题的研究

如前所述,“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独特社会现象,西方国家并未经历过。因此,有关发展经济学、贫困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理论都没有涉及农民工贫困线的相关问题。但是,国外探讨贫困问题及如何测定贫困线等相关理论,对于我国测定农民工贫困线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应该说,英国学者布什和朗特里是最早研究贫困线的。在布什的著作《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①和朗特里的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②,以及之后他们的研究内容中,都是主张从绝对贫困角度(维持基本生活)出发,为贫困居民提供相应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基本生存。这一研究方法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时至今日,它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与以上方法不同,彼特·汤森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贫困线测定方法,即以相对遗缺来度量贫困。他认为,“与需求相对应的遗缺能够被客观的测定,相对遗缺就是指从日常生活方式中排除某种需求,这样可以更好地从基本

^① 布什(Booth):《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Labour and Life of the People in London*),伦敦:威廉姆斯和诺加特出版社1889年版。

^② 朗特里(Rowntree):《贫困:城镇生活研究》(*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01年版。

生活需求方面界定贫困指标。他测定贫困的方法是制定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清单,若是清单上的某一指标在家庭中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就可以认为该家庭是贫困的”^①。1969年美国学者奥珊斯基(Orshansky)在《劳动月刊》上发表论文《如何度量贫困》,提出以一种新的方法来度量贫困,该方法是建立在著名的恩格尔定律的基础之上的。她提出:“可以用家庭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平均值,作为贫困测定的标准,如果一个家庭生活必需品支出的三分之一是用于食品消费,则这个家庭可以认定为贫困。”^②后来的学者对此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它命名为“恩格尔系数法”。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贫困线测定方法,如英国学者阿尔柯克在其著作《认识贫困》一书中提出了收入替代法、标准预算法和剥夺指标法三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③;美国的经济学家马丁·布雷林将食品分配法和食品能量法两者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提出以已知食物贫困线为基础,利用回归模型求出非食物贫困线,二者相加得到高低贫困线这一新的贫困线测定方法,命名为“马丁法”;国际贫困标准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2008年改为每人每天1.25美元极端贫困人口标准和每人每天2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测定相对贫困线的方法;荷兰学者克拉斯·德沃和奥迪·海根纳斯还站在测定主观贫困线的新立场,提出以“自我感觉生活需要不足”来定义贫困线。

西方国家在关于贫困线的测定方法上从最初维持生存的绝对贫困角度出发,后来逐渐发展为客观绝对贫困标准、客观相对贫困标准和主观贫困标准三大类。各国具体所采用的贫困线测量方法是综合本国国情,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因素来进行选择的。

二 国内对农民工贫困线问题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测定贫困线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童星、林闽钢在《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一文中,依据荷兰的克拉斯·德沃和奥迪·海根纳斯提出的从客观绝对贫困标准、主观

① 彼特·汤森:《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3页。

② 奥珊斯基(Orshansky):《如何度量贫困》(*How Poverty is Measured*),《劳动月刊》1969年第92期。

③ 阿尔柯克:《认识贫困》(*Understanding Poverty*),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版。

贫困标准和客观相对贫困标准三个视角来进行贫困测量,提出了三类共12种度量贫困的定量方法^①。祝梅娟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各种贫困测定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将贫困测定方法从理论方法和实际操作方法两方面进行了分类。“理论方法有福利函数法和福利指标化法;实际操作有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马丁法、国际贫困标准、数学模型法。”^② 骆柞炎在祝梅娟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增加了因子分析法和调整基期法等方法。^③ 香港学者周勇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富裕城市中的贫困》^④一书中系统介绍了他在香港运用生活形态法进行调查的情况,应该说,该书是最早就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论述的中文著作。台湾学者林亿万的《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⑤、孙建忠的《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⑥都用一定的篇幅对有关贫困线测定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2007年金莲在《城镇农民工贫困程度的测度》一文中,首次对测算农民工贫困线进行了研究,她采用恩格尔系数法,以贵州的背篓军为例,测算出城镇农民工的贫困线为人均248.40元/月^⑦。

我国学者对贫困线的测定方法的研究沿用了客观绝对贫困标准、客观相对贫困标准和主观贫困标准三类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推动我国农民工贫困线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农民工贫困线研究的理论基础,本课题的研究工作也是在参考借鉴这三大类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的贫困线研究界定,主要是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忽略了个人主观方面等其他因素。用目前贫困线的标准来识别农民工贫困人口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完全反映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现状。其二,对于农民工贫困线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主流经济学没有重视农民工贫困线的研究,针对农民工贫困线的研究文献

① 12种测量方法分别是:收入等份定义法、收入平均数法、商品相对不足法、热量支出法、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超必需品剔除法、总支出与总收入法、编制贫困指数法、数学模型法、主观最小收入定义法、主观最小消费定义法。

② 祝梅娟:《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最优选择》,《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6期。

③ 骆柞炎:《利用线性支出系统ELES测定贫困线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6年第3期。

④ 周勇新:《富裕城市中的贫困》,(中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2年版。

⑤ 林亿万:《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中国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年版。

⑥ 孙建忠:《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中国台北)时英出版社1995年版。

⑦ 金莲:《城镇农民工贫困程度的测度》,《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和数据资料很少。

第四节 研究对象、内容、基本框架及方法

一 研究对象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它兼有农民与工人的双重身份，主要指在第二、三产业中务工的农民。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流动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包括在居住地乡镇务工的农民工。狭义的农民工则不包括后者。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在西部地区乡镇以外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者。

二 研究内容

第一，系统梳理国内外有关农民工的理论，厘清其研究的框架、趋势和不足，进一步明确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研究的方向及减贫思路。

第二，廓清有关农民工贫困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研究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应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民工以及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动的背景、原因及其贫困的特征。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既有外部因素，同时也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低和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内部因素是：自身素质低、家庭负担重、城市生活的能力差以及社会支持网络弱化。

第四，提出缓解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的一系列对策思路。提出应从提升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整和完善社会政策、推动城乡一体化等几个方面来解决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问题。

三 理论框架

西方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与论述非常多，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也各有自己不同的角度和体系。本书主要借用发展经济学中的“推拉”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动的原因。指出由于农民工的流动，使农

民工遭受了来自城市社会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出现贫困现象，进而在分析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缓解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的对策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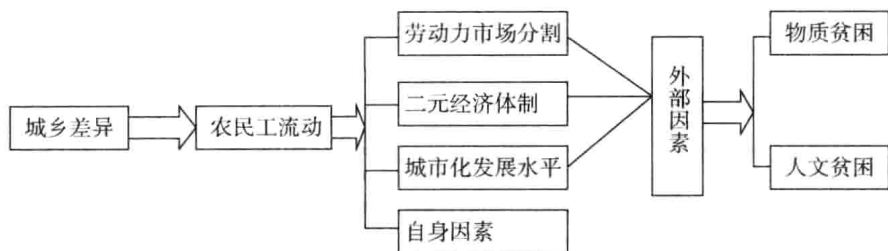


图 1-1 农民工流动及贫困原因

四 研究方法

第一，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主要选取了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会城市——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兰州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同时课题组采取便利性原则，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学城内的几个建筑工地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主要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其一，随着大学城规模的不断扩大，基于学生消费群体的增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此居住。这些流动人口多半以上是来此打工和做小生意的农民，他们的职业以流动商贩、小店老板为主，由于大学城一直处于建设和施工当中，所以在此又聚居了大量的建筑民工，成为长安区一个重要的农民工集散地。其二，课题组成员主要是大学城的几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大学城的地理位置比较熟悉，便于实地观察和访谈。

我们设计的《西部地区农民工贫困问题调查问卷》（见本书附录）由 6 个部分 76 个问题组成，内容包括农民工的工作、收支状况、人身权利、居住条件、医疗保障、精神生活、社会满意度等方面。随机发放问卷 1100 份，收回 1093 份，去除无效问卷 22 份，合计有效问卷 1071 份，回收率为 97.4%。问卷基本采用自填法，对不识字的调查对象视具体情况对问卷的内容进行了逐一访谈。同时，课题组成员在大学城几所大学的施工现场、餐厅等对多位农民工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细致的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外出打工的原因，打工前后收支的差别，社会认同等方面，